

初國中國文課本「古典文學」編選結果與典律的關係

侯雅文
政治大學

本文旨在探討初國中國文課本內，有關「古典文學」編選的結果與既有「典律」之間，彼此符應的程度。在西方有關「文學典律」的論述中，已經指出學校教育是「典律」所以形成或延續的要素之一。就本國的教育經驗而言，在國中的階段，開放民編本之前，主要是由政府主導國文課本的編選活動，並透過學校課程，完成大多數國民的「古典文學」教育。基此，探討初國中國文課本的編選結果，有助於我們掌握既有的「典律」獲得延續的狀況。

為達上述目的，本文一方面統計、分析、歸納民國四十二年到九十四年之間，初國中國文課本內，獲選次數較高的古典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則依藉現今大學中文系普遍採用的「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以及其他古典文學選集、一般性論著，列舉出既有的「典律」，以為參照之用。從上述二項結果的比對，觀察初國中的古典文學教育繼承典律的程度，或是偏離典律的趨向。

透過研究可知，上述獲選次數較高的古典文學作品，不見於「文學史」著作者，比例頗高。這些作品所以能被「典律化」，另與政黨、時代風潮、具有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等外部因素，有密切的關係。為了更全面地掌握中學國文課本與「典律」之間的關係，日後將繼續探究高中國文課本「古典文學」的編選結果。

關鍵詞：初級中學、國民中學、國文、古典文學、典律、文學史

壹、論題的界說

本文旨在觀察初國中國文課本「古典文學」編選結果與既有文學典律（*canon*）（以下簡稱「典律」）之間符應的程度，藉以探討促使典律形成、延續的外部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初國中的國文教育，對於建立一般國民的基本文學史知識究竟產生多大的功效。

編選作品的活動，是文學批評的型態之一。在文學批評的過程中，經常會對於作品進行評價。然而，並不是所有受到正面評價的作品均可稱為「典律」。基此，我們有必要對那些被推崇的作品，依據它們典律化的程度，分別以「典律」、「預期性文學典律」（以下簡稱「預期典律」）和「示範性文學作品」（以下簡稱「範文」）來區隔之。

此處的「典律」取最寬泛的用法，係指那些

因為蘊涵了某種道德、藝術等價值，並普獲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群體之認可，故而在創作或是閱讀上，具有規範效力的篇章或專書。基於這樣的定義，所謂的「典律」具備下列四種特性：「規範性」、「群體認同性」、「歷史積累性」、「作品限定性」。此處「作品限定性」係指具有文學性的單一文章或是典籍，至於純以論理、記錄為主，而不具備文學性的作品，不得與之。至於所謂的「預期典律」係指某些作者的特定著作，蘊涵了某種普遍價值，其規範性受到不同群體的認可；雖然尚未通過歷史積累的試煉，但是可以預見未來它很有可能成為典律者。「範文」係指某些作家的特定作品，蘊涵了某種性質，可以體現特定個人或社會群體的價值取向，因而被擇出以為示範之用者，但是未必具有上述「典律」的四種特性。

所謂的初國中國文教育，係指民國以來，由政府設置專門教育機構，透過文學作品的教學，為13歲到15歲青少年傳授語文知識的教育體制。民國五

侯雅文，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侯雅文，116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政治大學中文系。E-mail: aven@nccu.edu.tw

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前，稱為「初級中學」，五十七年之後，改稱「國民中學」。初國中國文課本是群體教學行為的媒介，它可以延展既有典律的地位，也可能創造預期典律，乃至於新的文學典律。透過本論題的研究，一方面有助於掌握既有典律獲得延續或遭受忽視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掌握那些預期典律正逐漸被形塑出來。

在本論文之前，已經有不少學者對初國中國文課本相關的議題進行探究。其研究路向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乃是以初國中國文的課程標準或是國文教材編輯經驗為主要研究對象，或是探討課程標準的演進歷程，或是描述、記錄教材編輯的歷史。有關課程標準的討論，如〈國中國文科課程標準的演進與探討〉（劉美吟、楊惠珍，1997），有關教材編輯歷史的描述，如〈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回顧：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統編本的演進與定位〉（董金裕，2001）等等。第二類乃是分析國中國文教材編選的結果，如〈國中國文教科書中臺灣文學作品之編選研究〉（王碧蓮，2004）等等。第三類乃是從外部社會文化的角度去評論國文教材的編輯理念，例如《教科書市場的多元假象——以我國國中國文教科書為例》（陳玉玫，2004），即從「商業行銷」的角度去評論國文教材的編輯結果等等。

上述第一類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了解初國中國文課本編選的理念及標準，然而這一類的研究成果，並未針對編選的結果進行直接而詳細的分析。就處理典律的論題而言，編選結果的研究是基礎，這一類成果能提供的幫助有限。不過，由於這類成果有助於我們掌握初國中國文課本的版本狀況，對本文在處理史料範圍的界定時，提供相當多的參考效用。第二類研究成果，的確針對初國中國文課本的編選結果進行詳密的分析。不過這類研究成果，大多選擇特定的版本及文類；對於作品編選的分析，偏重描述題材分類與作家作品數量統計的客觀事實，而非從「典律」角度，去詮釋那些客觀事實所隱涵的意義。然而，這部分的論題正是本文

所欲探究者。第三類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課本外部的社會文化因素，至於編選結果並非這類論題的重心，故這類研究與本文所欲處理的論題最不相關。

對於初國中國文課本與典律之關係的論題而言，從「典律」的論點去對編選結果進行分析、提問是起點，但絕非終極目的；如欲完滿處理此一論題，必然要另就編選者的編選觀點、教師的詮釋觀點、學生的接受程度，乃至於整體社會文化的環境進行延伸性的系列探究。然受限於篇幅，僅能依照此一系列研究的順序，先就初國中國文課本「古典文學」編選結果與「典律」的關係提出討論。

相應於上述所界定的論題，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史料，係指民國四十二年到九十四年之間，先由「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主編，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所發行的「國文課本」，以及後來由國立編譯館所主編的「國文課本」，與開放民間編輯後，由各坊間出版社所主編、教育部審定的「國文課本」。至於「文化基本教材」、「選修國文」、「國學概要」、「國學常識」等編本暫不予以討論。所以選擇這段時間的「國文課本」進行研究，理由如下：

其一，民國四十一年、五十一年、五十七年、六十一年、七十二年、七十四年、八十三年、八十九年均會對初國中國文科課程標準提出修訂。上述除了八十九年所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以及稍後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草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分別就聽、說、讀、寫的學習目標，制定具體的教材編選原則；其他的課程標準，僅概略地羅列「編選原則」（教育部，1956、1965、1971、1982、1983、1995、2002、2003）。從內容上看，自民國四十一年到八十三年所修訂的課程標準，其「編選原則」大同小異。相同處如「思想純正、旨趣明確、文字淺顯、材料新穎、層次清楚、理論精闢、詞調清暢、情真意切、韻味深厚」，從這些用詞來看，大體彰顯了某種美善的價值。而獲選的文章須符應這些美善的價值，並通過課程的安排讓學生

遵服之。相應本文所謂「典律」的「規範性」而言，此一情況具有意義。

其二，根據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頒布「選定高初級中學三十八學年度教科用書名單」，可知高初中國文課本由教育部審定，並由政府統一編印，此一編本簡稱「統編本」，此時國文課本的編選標準，只是一般性原則。不過，民國三十七年、四十一年教育部爲了符應「行憲」以及「反共抗俄」之基本國策的需要，已經著手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此一修訂後的課程標準落實在民國四十二年出版之初中國文課本。稍後隨著國家政策的調整，反映在課程標準上，則編選的原則亦略有調整。直到民國九十一年，國中國文課本「統編本」停版，民間依據最新課程標準編印課本，送交教育部審定，此一編本簡稱「民編本」或稱「審定本」（藍順德，2003）。在這段時間，「國文課本」雖然歷經「統編」到「民編」的演變，但始終因依「群體意識」而編選。就「統編本」而言，此一「群體意識」透過由政府所主導的編選行爲體現出來。就「民編本」而言，大抵由出版社邀請大學院校中文系資深教授擔任主編，統領諸多學者與中學教師完成編選結果。編選前後，均曾徵詢或參酌國中國文教師使用的感受。又此一編選結果必須通過教育部的審定。基此，國文課本出版的結果，乃編選者、審定者與國中教師形成共識的產物，此正體現了「群體意識」。相應本文所謂「典律」的「群體認同性」而言，此一情況具有意義，故選定此一範圍的課本做爲討論的對象。

其三，雖然初國中國文科課程標準曾經多次的修訂，而選文亦相應調整；然而某些「範文」不斷地重覆獲選。民國九十一年之前，國文課本係由教育部編印，因而不同編本「範文」重覆獲選的結果，呈現了歷時縱向的積累意義。民國九十一年之後，國文課本係由不同的出版社編印，各出版社內容未必完全相同。基此，獲選的「範文」，若與九十一年之前出版者重覆，則呈現了歷時縱向的積累意義。

若不同出版社編選的「範文」相同者，則呈現並時橫向的延展意義。基此，這些重覆獲選的「範文」，其規範性在「歷時縱向」與「並時橫向」的積累下，逐漸凝聚成一超越特定時空的群體共識。相應本文所謂「典律」的「歷史積累性」而言，此一情況才具有意義。因此我們選擇民國四十二年到九十四年這一段時間，初國中國文課本的編選結果進行研究，而捨棄僅就單一課程標準所編定的國文課本進行研究。又此處的「範文」往往指某一作家的特定篇章或是典籍中的特定篇章，相應本文所謂「典律」的「作品限定性」而言，此一情況具有意義。

爲達本文之研究目的，採下列之研究方法：

一爲採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即透過「編選版本」與「印刷版次」累計的結果，找出獲選次數較高的作家作品，由此呈現初國中國文課本「古典文學」的重要「範文」。

所謂「編選版本」與「印刷版次」的區分如下：即依照不同年次修訂的課程標準而編定的課本，稱爲「編選版本」。至於本諸同一年次修訂的課程標準，而逐年印刷的課本，稱爲「印刷版次」。民國四十二年到九十四年之間，獲選的文學作品不少。在未開放「民編本」之前，每一次修訂的課程標準，僅適用於一至二個「編選版本」；雖因逐年印刷，而有不同的「印刷版次」，但是內容大致相同。當然，也會遇到例外情況，即同一編選版本，在逐年的印刷版次中曾經微調增刪文章。倘若這些被微調增刪的文章，獲選的時間短暫，則其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有限，那麼我們將不予討論。開放「民編本」之後，同一年次修訂的課程標準適用的「編選版本」甚多。爲了討論方便，此處擇取國中使用率較高的版本加以探究。本文儘可能地根據民國四十二年到九十四年之間，各「編選版本」全六冊完整出版的初國中國文課本進行討論；而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所收藏者，僅有少數版本、版次未能獲見，其他大體完備，足資參考。

民國八十九年所修訂之課程標準，正式施用於

九十一年初版的「國文課本」。這個「編選版本」只累計 2 個印刷版次，直到九十二年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新的「編選版本」印行。相較於九十一年之前的「國文課本」出版狀況而言，這段時期選文結果顯得較不穩定。目前，各家出版社已於九十四年二月完整出版「國中課本」六冊，這是依據八十九年課程標準初版的第一個印刷版次。至於該課程標準「編選版本」的第二個印刷版次，以及依據九十二年課程標準的「編選版本」均未完整出版「國中課本」六冊。又自八十九年課程標準初版的第二個印刷版次，有些出版社已對選文結果進行增刪，或是調整選文所在冊數，因此尚未呈現完整的編選結果，凡此不適合作為本文討論的對象，俟日後再進行追蹤研究。底下，我們將統計的範圍限定在自四十一年課程標準「編選版本」初版之國文課本，到八十九年課程標準「編選版本」初版的第一個印刷版次所出版的六冊國文課本。

二為採用分析、歸納的方法，即參考課文內容或課本所提供「題解」等資料，分析範文的內容情意，並加以歸類，從而觀察國文課本所呈現特定的「規範性」。

三為採用參照比較的方法，一方面透過「中國文學史」的著作，提出正統文學的既有「典律」，作為參照比較的依據。此乃因為「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在撰寫上雖然免不了因為作者不同的「史觀」，因而對寫入「文學史」的作品評價不一。可是，對於那些作品應該被寫入，而予以討論者，各家文學史著作的內容並未呈現很大的分歧。凡此顯示了民國以前，古典文學的「典律」已經形成。此處以《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杰，1990）、《中國文學史》（葉慶炳，1990）、《中國文學史初稿》（王忠林等八人，1985）為主，以提舉古典文學的「典律」。所以選擇這三本著作，是因為在大學中文系的教程中，普遍將這三本著作列為文學史課程的教科書，影響深遠，故以為代表。

但「文學史」著作不免因為宏觀的書寫取向，

因而不能涵蓋所有的既有「典律」，可見後文所論。故本文另一方面通過古典文學選集、一般性論著等史料，提出「文學史」著作所未記錄，實已存在的「典律」，作為參照比較的依據，以便彰顯補充「文學史」著作的不足。凡此有助於我們對於初國中國文課本編選結果符應或偏離既有「典律」的判斷，更加周全。

貳、初國中國文課本中選錄次數較多的「古典文學」範文

本節將就「篇名」、「作家」、「獲選版本／版次」、「主題類型」來呈現「古典文學」編選的結果。從「獲選版本／版次」累積的狀況，可以看出某些「範文」、「主題」具有重要的地位。至於各篇文章所歸屬之「主題」的界義，底下先略作說明：

- 一、道德：係指以人際互動時所體現是非善惡的理想價值為內涵的主題。底下可再區分「一般道德」與「忠勇報國」二個次類。「一般道德」係指人我對待的倫理或個人品格、節操。至於「忠勇報國」本應歸屬於「君臣」倫理，然而在國文課本的編選中，這類主題不同於一般倫理，另有因應特定時代的編選考量，故此處獨立為一類。
- 二、為政：係指以建立與政治有關的事功為內涵的主題。這類主題雖然與國家有關，然而未必具有善惡是非的價值判斷，故別為一類。
- 三、農事：係指以農業生產為內涵的主題。
- 四、為學：係指以致力讀書，求取學問為內涵的主題。
- 五、人生智慧：係指以經驗閱歷的累積而產生的決斷能力為內涵的主題。
- 六、抒情：偏指以人際聚散所產生的情感為內涵的主題，這類作品雖然在題材上，與田園或山水有涉，然而由於偏重人際情感，故別為一類。此外，由於特定時代的編選考量，故另將此類中有關「家國關懷」的篇章別為次類。基此，

在這一類中可再分「一般抒情」以及「家國關懷」二個次類。

七、興趣：這一類在意義上，既包含魏晉以來所興起「緣情」、「起情」的觀念，指因自然景物而興發的情感，又融合了明代謝榛《四溟詩話》中所提出的「趣格」（明·謝榛，1983），因而兼攝人文世界中因物而起的情趣。在這一意義下，可將此類區分為四個次類：（一）田園興趣；（二）山水興趣；（三）藝術興趣；（四）生活興趣。

底下，將初國中國文課本中，以特定主題，或單一文章獲選的版本多達四種以上，印刷版次多達20次以上的「古典文學」範文，表列如後。

參、初國中國文課本的重要範文與既有典律之間的同異及其意義

底下，我們先就範文所歸屬的文類、撰寫的年代、代表作家，與「文學史」的著作進行參照，從而提出問題。以「古典散文」而言，泛指相對韻文者。這五十年的期間，古文選文大體集中在「先秦」和「清代」。又上表所列重要古文與「文學史」著作所列舉的典律相符合者，僅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吳均〈與宋元思書〉。至於相異者，可分為下列二種情況：

一是有些著作本不以抒發情志或是表現藝術技巧為寫作的目的，而是以人生義理、歷史興亡的軌跡作為論著的主旨。例如上表所列《論語》、《孟子》、《史記》、《後漢書》等。又這些著作有的採篇章之分，然而各篇之間因本諸共同的旨趣，故而統整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文學史」的著作中，的確以《論語》、《孟子》、《史記》為古文之典律，並肯定這些著作在思想上或是藝術技巧上，對於後代的作家，具有深遠的影響；不過，在論述上乃針對全書而言，並未特別突顯某些篇章。至於《後漢書》在「文學史」的著作中，並不被提及，此乃因它以記錄史事為主；又在藝術技巧上，並未對後代的作

家，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從上表可知，「國文課本」卻長期選錄《論語》、《孟子》、《史記》、《後漢書》的特定篇章，因而使得這些個殊的篇章取代全書，而朝典律化的趨勢發展。

二是某些作家基於文學改革的理想，提出特定主張，並以作品實踐之；同時能喚起同時代眾多作家追隨，進而形成時代文風。這類作家作品往往成為「文學史」著作中的典律。例如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作家韓愈和柳宗元。韓愈的〈原毀〉、〈毛穎傳〉，柳宗元〈三戒〉、〈蝘蝓傳〉等往往見於「文學史」著作。同理，如宋代古文運動中，歐陽修〈新五代史記伶官傳序〉、〈醉翁亭記〉，蘇軾〈前後赤壁賦〉、〈記承天寺夜遊〉等等，蘇轍〈黃州快哉亭記〉等，明代唐宋派歸有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公安派袁宏道〈西湖遊記〉，清代桐城派方苞〈左忠毅公軼事〉、曾國藩〈聖哲畫像記〉等等，均是文學史著作所公認的「典律」。

反觀「國文課本」對於上述「典律」，有的曾加以選錄，然而次數很少，有的從未選錄。當然，上述典律有的篇幅過長，有的旨趣太過深遠，不適合國中生學習，而另獲高中課本選用，例如歐陽修〈醉翁亭記〉、方苞〈左忠毅公軼事〉等等。但是像柳宗元〈三戒〉、〈蝘蝓傳〉，袁宏道〈西湖遊記〉之類的文章，篇幅適中，文字淺近，又饒富情理，卻也少見獲選。至於「國文課本」選錄次數頻繁者，反而不見於「文學史」著作，此可見於上表所列周敦頤、岳飛、鄭成功、李文炤、彭端淑、劉蓉、鄭燮、李慈銘、沈復、林覺民等人作品。其中，周敦頤雖見於「文學史」著作，然而僅概述《周子通書》中的文學觀，並不列舉「典律」。又鄭燮在「文學史」著作中享有重要地位，主要是因為詩歌，並非古文。

以「古典詩」而言，收錄的篇數僅次於「古文」，這五十年之間，獲選的作品大體集中在「唐代」。又上表所列重要詩作與「文學史」著作所列舉的典律相符合者甚多，如陶淵明、李白、杜甫、

表 初國中國文課本重要範文獲選版本／版次統計表

篇名	作家／書名	獲選版本／版次	主題類型
〈學而〉：學而時習之……不亦君子乎。	論語	57年修訂課程標準編選版本，共5版次（以下簡稱57／5）。83年修訂課程標準編選版本正式本，共4版（以下簡稱83正／4）。89南一版（以下簡稱南）	一般道德／倫理、品格為學
〈學而〉：弟子入則孝……則以學文	論語	57／5，89育成版（以下簡稱育）	一般道德／倫理、品格為學
〈子罕〉：譬如為山……吾往也	論語	74年修訂課程標準編選版本正式本，共3版（以下簡稱74正／3），74年修訂課程標準編選版本改編本，共6版（以下簡稱74改／6），83正／4，南，育	為學
〈為政〉：孟懿子問孝……祭之以禮	論語	57／5，74正／3，74改／6，83正／4	一般道德／倫理
〈為政〉：子游問孝……何以別乎	論語	74正／3，74改／6，83正／4	一般道德／倫理
〈為政〉：子夏問孝……曾是以為孝乎	論語	57／5，74正／3，74改／6，89翰林版（以下簡稱翰）	一般道德／倫理
〈離婁〉：齊人有一妻一妾者……幾希矣	孟子	41年修訂課程標準編選版本，共8版次（以下簡稱41／8），51年修訂課程標準編選版本，共5版次（以下簡稱51／5），61年修訂課程標準編選版本改編本，共2版（以下簡稱61改／2），74正／3，74改／6	一般道德／品格
〈告子〉下：舜發於畎畝之中……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	51／5，61年修訂課程標準編選版本，共7版（以下簡稱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翰，育	人生智慧
愚公移山	列子	41／8，51／5，57／5，61／7，74正／3，74改／6，83正／4，育	人生智慧
田單以火牛攻燕（田單復國）	司馬遷	41／8，51／5，57／5，61／7，61改／2，74正／3，74改／6	忠勇報國
張釋之執法	司馬遷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89康軒版（以下簡稱康），育，南	為政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翰，南	一般道德／品格
歸園田居	陶淵明	67／7，61改／2，74正／3，74改／6，83改／6，	興趣／田園
張劭之死友	范曄	48／8，51／5，74正／3，74改／6	一般道德／倫理
書荀巨伯事	劉義慶	41／8，51／5，67／7，61改／2	一般道德／倫理
與宋元思書	吳均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	抒情
木蘭詩	佚名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翰，育，南	一般道德／倫理
登鶴鳴樓	王之渙	51／5，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翰，南	人生智慧
過故人莊	孟浩然	57／5，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翰，育，南	抒情
觀獵	王維	41／8，51／5，74正／3，74改／6	忠勇報國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育，南	抒情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翰	抒情／家國關懷
楓橋夜泊	張繼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	抒情
慈烏夜啼	白居易	41／8，57／5，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翰，育	一般道德／倫理
陋室銘	劉禹錫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育，南	一般道德／品格
愛蓮說	周敦頤	51／5，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翰，育，南	一般道德／品格
滿江紅（怒髮衝冠）	岳飛	41／8，51／5，57／5，61／7，61改／2，74正／3，74改／6	忠勇報國
良馬對	岳飛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育	為政
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鷺）	辛棄疾	61／7，61改／2，74正／3，74改／6，南	興趣／田園
四時讀書樂	元·翁森	57／5，61改／2，74正／3，74改／6，83正／4	為學
書付尾箕兩兒	明末·楊繼盛	51／5，57／5，74正／3，74改／6	一般道德／品格
核舟記	明末·魏學洵	41／8，51／5，57／5，83正／4	興趣／藝術
甲申日記二則	明末·黃淳耀	41／8，61／7，61改／2，74正／3	一般道德／品格
與荷蘭守將書	鄭成功	51／5，57／5，61改／2，74改／6，83正／4，翰，育	為政
空城計	三國演義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南	人生智慧
儉訓	清·李文炤	41／8，51／5，61／7，61改／2，74正／3，74改／6	一般道德／品格
勤訓	清·李文炤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翰，育，南	一般道德／品格
為學一首示子姪	清·彭端淑	41／8，51／5，57／5，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翰，育，南	為學
兒時記趣	清·沈復	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翰，育，南	興趣／生活
寄弟墨書	清·鄭燮	51／5，61／7，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南	農事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	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翰，育，南	一般道德／倫理
越縵堂日記四則	清·李慈銘	41／8，51／5，74正／3，74改／6，康	興趣／生活
習慣說	清·劉蓉	41／8，61／7，61改／2，74改／6，83正／4，翰，育	人生智慧
大明湖	清·劉鶚	51／5，57／5，61改／2，74正／3，74改／6，83正／4，康，育，南	興趣／山水、生活
黃河結冰記	清·劉鶚	51／5，57／5，61／7，61改／2，74正／3，74改／6	興趣／山水、生活
與妻訣別書	林覺民	41／8，51／5，57／5，61／7，61改／2，74正／3，74改／6	忠勇報國

註：本表由作者根據國立編譯館所收藏的「國中課本」，自行統計、歸納、分析而成。

白居易、王之渙、孟浩然等人的作品。至於唐代張繼、元代翁森的作品，則不見於「文學史」著作。

以「古典詞」而言，收錄的數量上遠不如古文、詩，相同的情況亦出現在曲、小說。這顯示了詩、文這二種文類在「國文課本」所占比例頗高，相較於此，詞、曲、小說所占比例甚低。導致這種情況，固然與文類產生時間的先後，以及單一文類下分化出來之次文類的多寡有關，是以「文學史」的著作中，對於詩、文的敘述也呈現最完備的情況。然而「文學史」著作為了突顯某一文類，作為特定時代的代表文學，往往亦會對同一時代不同文類的敘述篇幅，進行多寡的分配，以強調時代文風的主從。可是「國文課本」對於上述各文類的選文比例太過懸殊，並不容易呈現時代文風的特色。

又上表所列重要詞作與「文學史」著作所列舉的典律相符合者，僅有辛棄疾的作品。至於備受「國文課本」青睞的岳飛〈滿江紅〉（怒髮衝冠），則少見於「文學史」著作。又「文學史」著作中，以辛棄疾為豪放詞風的代表人物，故所列舉的作品，多屬此類風格，然而上表〈西江月〉一詞，主要抒發農村生活的情致，並不能體現辛棄疾詞作的特色。

以「古典曲」而言，未見可列為重要範文者。馬致遠、張養浩、張可久的作品雖曾獲選，且與「文學史」著作所列舉的典律相符合，然而獲選的版本或版次數不不夠多。至於關漢卿以抒發男女之情，頗能呈現元曲本色，因而受「文學史」著作重視的那些作品，卻不見於「國文課本」。

至於「古典小說」，上表所列重要小說與「文學史」著作所列舉的典律相符合者，有羅貫中、吳敬梓、劉鶚的作品。其中《儒林外史》、《老殘遊記》本屬於諷刺或是譴責小說。然而「國文課本」所選錄者，一則係王冕孝親力學，一則係〈大明湖〉、〈黃河結冰記〉之類寫景細膩、文字優美的記遊文字，這些作品嘲諷意味淡薄。對於小說而言，「嘲諷社會時政」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國文課本」卻忽略此一主題，其中的意義耐人尋味。

上述「國文課本」所錄的重要範文，固然有取自經典或「文學史」著作所公認的「典律」；然而《論語》、《孟子》、《史記》的選錄結果，則另與政治因素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上述論、孟獲選的篇章，強調「孝」、「恥」的價值。民國五〇年代開始，國民政府積極推行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並由總統主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這主要是為了對顯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的的正當性，進而確立國民政府統治的合理性（漢寶德，2001；朱惠良，2004）。在此一運動下，「四書」成為宣揚「四維八德」之傳統文化的最佳根據。而「國文課本」編選者的傳統文化意識正與此一政治訴求合流，故呈現上述的編選結果。又《史記》中〈田單復國〉一文特別受到重視，亦與國民政府之「復國」的政治訴求有關。國民黨取得在臺灣的統治權之後，積極地凝聚反共復國的全民意識。蔣故總統〈對五十三年行憲紀念大會致詞〉中，便以田單復國的史實為範例，勉勵與會者（秦孝儀，1984）。「田單」一度代表了國民黨的政治英雄，因而廣被人知。至今仍有「田單黨部」的稱號。基此，則這類特定篇章，所以被「典律」化，另有來自政治力量的運作。

上述所列不見於「文學史」著作，卻頗受「國文課本」重視的範文，有的早就獲得歷代文人的肯定，其「典律」地位已經確立；有的則未累積出歷史評價。底下分別論述。就「典律」地位早已確立者而言，可以張繼、周敦頤為例。

張繼是玄宗時的詩人。唐朝以來，張繼的〈楓橋夜泊〉屢被提及、選錄。例如《中興閒氣集》已論及張繼的詩風並選錄了此詩（唐·高仲武，1983），宋代《六一詩話》（宋·歐陽修，民1991）、《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1967）、清《詩辨坻》（清·毛先舒，1985）均曾以此詩為例論詩。此外，宋人編選《千家詩》（1996），明代《唐詩品彙》卷五十（明·高棅，1983）、《唐詩選》卷八（明·李攀龍，1974）、清代《唐詩別裁集》卷二十（清·沈德潛，1998）、《唐人萬首絕句選》卷四（宋·洪邁、

清·王士禎，1983）、《唐詩三百首》（清·蘅塘退士，1987）等多種選本均曾選錄此詩。由此可見張繼這首詩自唐至清廣為流傳。然而何以「文學史」的著作卻不錄？或者以為張繼流傳的作品不多，今《全唐詩》僅見四十七首。可是王之渙流傳的作品更少，今《全唐詩》僅見六首，何以「文學史」的著作卻推許王之渙的作品？其因在於王之渙作品的主題與「邊塞」有關。「邊塞詩」是唐詩中因應時代而產生的創作主題。例如《升庵詩話》所謂「唐人邊塞曲」（明·楊慎，1983）、《峴傭說詩》更以盛、中唐詩人詩作為「邊塞名作」（清·施補華，1971）。「文學史」著作中論及唐詩時，也往往強調這類以描寫邊塞生活經驗與風景為主的詩風。至於張繼〈楓橋夜泊〉所抒發的羈旅之感，屬於一般抒情之作，並不帶有時代特色，故未獲「文學史」著作青睞。

至於周敦頤的〈愛蓮說〉，自南宋至清，不但廣被選錄，更是文人創作時經常援用的典故。例如南宋《方輿勝覽》（宋·祝穆，1983），雖屬地理性質的書籍，然而《四庫全書》在該書前曾有如下評論：「有益於文章」、「故自宋元以來操觚者，不廢其書」，而此書曾錄〈愛蓮說〉。又元代許恕，明代楊廉、吳寬，清高宗等在創作時，往往引用〈愛蓮說〉的典故。此外像《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八（明·賀復徵，1983）、《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二十九（清·汪灝、張逸少，1983）等書，也曾加以選錄。由此可見〈愛蓮說〉廣為流傳，其「典律性」早已確立。然而「文學史」著作卻不錄。其因在於道學家的文學觀以「載道」為第一義，至於「文辭」則視為次要，甚至予以否定；而「文學史」著作對於古文的態度，大多比較重視能兼具「載道」與「文辭藝術」的正統主流「古文家」，例如韓、柳、歐、曾、三蘇，以至明清各派古文大家，是故對於道學家的作品，並未予以高度的重視。而周敦頤向來被推指為北宋「文以載道」之說的肇始者，是故「文學史」著作對於他的古文作品重視的程度不高。

綜上可知，「文學史」著作在選擇、詮評的取向

上，所考量者在於作品是否具有文學藝術性、是否具備文類的代表性，是否符合特定時代社會主題，是否足以代表文學運動的訴求，以及是否為第一級的作家。這類宏觀的書寫取向，使得它不能微觀照顧到所有的「典律」，而國文課本選錄的結果，有時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上述所列不見於「文學史」著作，卻頗受「國文課本」重視，但其「典律」地位尚未完全確立的範文，可以再分下列二種情況討論。第一種情況，係作品完成的年代甚早，但並未充分受到歷代文人學者的重視；第二種情況，係作品完成於清末，雖曾獲得文人學者的肯定，然而積累的程度不夠。

就第一種情況而言，可以岳飛、翁森、鄭成功、劉蓉、彭端淑、李文炤等為例。以〈滿江紅〉而言，雖然在明代有《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宋·何士信、明·陳鍾秀刊本，1989）、《草堂詩餘正集》（明·顧從敬類選、清·沈際飛評選，明刊本）、《西湖遊覽志》卷九（明·田汝成，1983），清代《宋稗類鈔》（清·潘永因，1983）、《七頌堂詞繹》（清·劉體仁，1985），曾加以選錄，或給予高度的評價。然而我們另就清代二本代表流派主張，因而在詞壇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選本：《詞綜》（清·朱彝尊，1971）與《詞選》（清·張惠言，1980），加以檢視，卻不見〈滿江紅〉一詞；此外，像清末的詞論家，則批評岳飛「詞以人傳，並非有獨到處」（清·陳廷焯，1983）。綜上可知，岳飛這首詞，大抵經由類書、地方古蹟傳播，因而在民間具有較高的知名度；然而從正統主流文學的角度來說，縱使曾對該詞給予肯定，但評價不高，故其「典律性」不足。凡此與前述周敦頤的作品廣受文人學者，甚至統治階層的認可，因而具備高「典律性」有別。又岳飛的古文，獲選者大多以政治軍事性質為主，例如〈五嶽祠盟記〉、〈奉詔移偽齊檄〉；至於〈良馬對〉一文，僅有少數選本加以選錄，如《南宋文錄》（清·董兆熊，1975），由此可見，其所具有的「典律性」也是不夠。

至於翁森，其生存年代介乎宋元之間。除了清代《宋詩紀事》曾錄〈四時讀書樂〉詩外（清·厲鶚，1983），其他如清代《宋詩鈔》（清·吳之振，1983）、《元詩選》（清·顧嗣立，1988）、《宋詩別裁集》、《元詩別裁集》（清·張景星，1998）等重要的宋元詩選本均未提及〈四時讀書樂〉。清末《元詩紀事》（清·陳衍，1971）收錄了八百多個元代詩人，其中沒有翁森，則可見其詩所具有的「典律性」不夠。

至於鄭成功〈與荷蘭守將書〉，不見於古文選集之中，此固然與政治因素有關，蓋清廷視鄭成功為「寇」、「賊」，其著作自然很難獲得清人重視；然而像《明文英華》（清·顧有孝，2000）之類的選本亦未選錄，可見就正統主流的文學角度來看，其典律性不夠。「國文課本」所錄彭端淑、劉蓉的作品，雖曾見錄於以樹立古文「先正典型」的《清文匯》（清·王文濡，1965），然而獲選的作品卻非「國文課本」所錄的那些篇章。此外像李文炤，所以受到學者的關注，乃基於他所撰寫《周易本義拾遺》、《太極解拾遺》等經學、道學之類的著作，至於〈勤訓〉、〈儉訓〉則乏人聞問。至於鄭燮的古文，不見於《清文匯》。

上述提及的「範文」，如翁森、彭端淑、劉蓉、李文炤、鄭燮等人的作品，純粹因為文章所宣揚的傳統文化思想有助於道德教育，故而長久獲得「國文課本」的選錄。然而其文學藝術性不夠，故不能廣被歷代文人學者所推崇；又即便獲得「國文課本」的重視，一旦脫離國中教學場域之後，它們所具有的影響力就消褪了。對此我們只要檢視「期刊論文」或「碩博士論文」，幾乎沒有人對這些文章加以討論，就可以推知它們無法被「典律化」。

至於岳飛「精忠報國」呈現了「民族英雄」的形象。鄭成功反清復明，驅逐荷蘭，以及在政治經濟上對於臺灣開發的貢獻，也成就了「民族英雄」形象，這可從眾多祠祀鄭成功的信仰經驗獲得印證。（傅朝卿，2000；翁佳音，2002）林覺民犧牲小我，投入革命志業，成就了「革命烈士」的形象。這些「民族英雄、烈士」的形象，正符合早期國民

黨「復國」的政治訴求；而鄭成功開發臺灣的貢獻，在政府提倡本土化的政策時，又正好能喚起臺灣人民的歷史意識。基於上述特定的政治訴求以及歷史意識的召喚，「國文課本」對這些範文長久地選錄，的確使得它們具有「預期典律」的態勢。然而，倘若它們不具有文學藝術性，那麼一旦政治環境改變了，或是人們不再重視特有的歷史經驗，這些範文的典律性就將無法獲得延續。

就第二種情況而言，可以沈復、李慈銘為代表。沈復一生以游幕、經商為主，政治地位不高；也不是文學運動中的領袖人物。又《浮生六記》主要抒發夫妻相處、日常雅事、以及游幕經歷的「生活情趣」，在敘述觀點上，採第一人稱，屬自敘傳性質。就內容情意而言，相較於傳統以政治教化為主流的古文，無法顯出其價值的重要性。又就「形式體製」而言，介乎小說與散文之間，因而文類屬性不夠明確，是故在「文學史」著作中不受重視。然而晚清之際，已有楊引傳、王韜等人予以推許。自五四以來，「求真」、「求自然」、「反封建傳統」的思潮大盛，《浮生六記》的內容正好符應此一思潮，其中尤以〈閨房記樂〉、〈坎坷記愁〉最具代表性，因而像俞平伯〈校點浮生六記序〉所言「家常言語，反若有勝宏大巨制」，林語堂〈享受大自然〉所言「文字極其自然，毫無虛飾」；由於受到俞、林等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的推許，進而發展成為「預期典律」。而「國文課本」一方面延續了民國以來對於《浮生六記》的推崇；另一方面長久選錄的結果，只突顯〈兒時記趣〉之類具有想像趣味的篇章，卻忽略那些更受五四文人所喜愛有關夫妻情趣的篇章。從這方面來看，「國文課本」的選錄結果形塑了新的「預期典律」。

至於李慈銘在晚清時，頗具文名，曾獲晚清重要的詩論家陳衍，以及任職尚書、軍機大臣的翁同龢等人之推許。民國以來，蔡元培在〈讀越縵堂日記感賦〉中，讚賞《越縵堂日記》云：「史評經證翻新義，國故鄉聞薈大觀」（蔡元培，1968），即指日

記中記載許多有關晚清政治經濟的現況，以及當時知識分子對於國事的觀感，極具史料的價值。今人查時傑、雍叔、張德昌等人均從政經的角度，研究並評論《越縵堂日記》的價值。至於《越縵堂日記》那些具有文學性的篇章，反而較少受到重視。而「國文課本」一方面延續了民國以來對於《越縵堂日記》的推崇；另一方面長久選錄的結果，使得那些具有文學性的篇章被突顯出來，進而形塑了新的「預期典律」。

肆、結論

綜合上述，可獲致下列結論：

- 一、在初國中國文課本編纂之前，「古典文學」的「典律」已經存在了。在歷代的閱讀過程中，「典律」所涵具的價值，表現在下列三方面：「社會教化」、「藝術美感」、「文學史認知」。基此，「典律」能否依藉初國中國文教育而獲得延續；以及初國中的國文教育如何選擇「典律」以達到教育的目的，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值得再詳作探究。
- 二、爲了達到上述的研究目的，本論文採取「統計」與「參照」的方法。一方面透過「編選版本」及「印刷版次」的統計，找出國中國文課本的重要範文；另一方面則透過文學史的著作，以及其他文學選集、一般性論著，提舉「典律」以供參照，從而考察初國中國文課本的編選結果與典律之間符應的程度。
- 三、透過上述的研究，可知初國中國文課本中長久選錄的「重要範文」，有些來自與「文學史」著作所列舉的「典律」相合，有些則來自與「文學史」著作之外而廣受歷代文人學者所推崇者，有些則完全不見重於歷代文人學者。
- 四、就「重要範文」與「文學史」著作所列舉的「典律」相合而言，「國文課本」發揮了延續若干既有「典律」的功能，大略有助於建立一般國民對本國文學史的概要認知。但由於相合的幅度

不高，能產生這方面的功能也就有限。此外，它選錄了「文學史」著作之外，廣受歷代文人學者所推崇的作品，則可補充「文學史」著作的不足。這方面的功能可以爲未來編選「古典文學」時，提供更開闊的視域。

- 五、初國中國文課本，有些是長期被選錄的重要範文。但這些範文卻未必皆能成爲「預期典律」，除非在它們「典律化」的過程中，受下列幾種作用力的影響：（一）政治運作的力量；（二）時代的風潮；（三）具有高度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
- 六、開放「民編本」之後，那些由統編本所形塑出來的「重要範文」，大體被延續下來。日後，「民編本」是否有可能走出「統編本」的影響，減低過度偏重政治道德教化意識，而回歸文學本位的教育取向，值得關注。

參考文獻

- （宋）何士信（1989）。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見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619附錄。
- （宋）洪邁編、（清）王士禎選（1983）。唐人萬首絕句選。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398，121。
- （宋）胡子（1967）。苕溪漁隱叢話。臺北：廣文書局，前集卷23。
- （宋）時人編選（1996）。千家詩。臺北：三民書局，363。
- （宋）祝穆（1983）。方輿勝覽。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229，541。
- （宋）歐陽修（1991）。六一詩話。臺北：世界書局，1038-1039。
- （明）田汝成（1983）。西湖遊覽志。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343，115。
- （明）李攀龍（1974）。唐詩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696。
- （明）高棅（1983）。唐詩品彙。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310，555。
- （明）賀復徵（1983）。文章辨體彙選。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346，367。
- （明）楊慎（1983）。升庵詩話。見續歷代詩話上。臺北：藝文印書館，卷4「耳衣」條下。

- (明)謝榛(1983)。四溟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卷2。
- (明)顧從敬類選、(清)沈際飛評選。草堂詩餘正集，明萬曆崇禎太末翁少麓刊本。
- (唐)高仲武(1983)。中興閒氣集。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集部271，140。
- (清)毛先舒(1985)。詩辨坻。見清詩話續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卷三，58。
- (清)王文濡(1965)。清文匯。臺北：世界書局，甲集卷60、丙集卷20。
- (清)朱彝尊(1971)。詞綜。臺北：世界書局。
- (清)吳之振(1983)。宋詩鈔。臺北：世界書局。
- (清)沈德潛(1998)。唐詩別裁集。湖南：岳麓書社。
- (清)汪灝、張逸少(1983)。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151，79。
- (清)施補華(1971)。峴傭說詩。見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997。
- (清)張惠言(1980)。詞選。臺北：廣文書局。
- (清)張景星(1998)。宋詩別裁集、元詩別裁集。湖南：岳麓書社。
- (清)陳廷焯(1983)。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濟南：齊魯書社，卷八，640。
- (清)陳衍(1971)。元詩紀事。臺北：鼎文書局。
- (清)董兆熊(1975)。南宋文錄。臺北：鼎文書局。
- (清)劉體仁(1985)。七頌堂詞繹。見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清)厲鶚(1983)。宋詩紀事。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424，578-579。
- (清)潘永因(1983)。宋稗類鈔。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340，392。
- (清)蘅塘退士選、俞守真編註(1987)。唐詩三百首詳析。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清)顧有孝(2000)。明文英華。見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集部34。
- (清)顧嗣立(1988)。元詩選。臺北：世界書局。
- 王忠林、左松超、皮述民、金榮華、邱燮友、黃錦鉉、傅錫壬、應裕康(1985)。中國文學史初稿。臺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 王碧蓮(2004)。國中國文教科書中臺灣文學作品之編選研究。臺北師院語文集刊，9。
- 朱惠良(2004)。我國文化政策總檢討。國政研究報告。
- 林語堂(1980)。生活的藝術。臺北：遠景出版社。
- 俞平伯(1990)。俞平伯散文雜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秦孝儀(1984)。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央委員會黨史會。
- 翁佳音(2002)。諸神讓位——鄭成功廟多現象之探究。歷史月刊，179。
- 教育部(1956)。四十一年修訂中學課程標準。臺北：臺灣書局出版
- 教育部(1965)。五十一年修訂中學課程標準。臺北：正中書局。
- 教育部(1971)。五十七年修訂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臺北：正中書局。
- 教育部(1982)。六十一年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臺北：正中書局。
- 教育部(1983)。七十二年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臺北：正中書局。
- 教育部(1995)。八十三年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臺北：教育部。
- 教育部(2002)。八十九年修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草案)。臺北：教育部。
-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臺北：教育部。
- 陳玉玫(2004)。教科書市場的多元化假象——以我國國中國文教科書為例。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92NHU05665019。
- 傅朝卿(2000)。臺灣祭祀鄭成功廟宇的調查研究。臺灣文獻，51-2。
- 葉慶炳(1990)。中國文學史。臺北：學生書局。
- 董金裕(2001)。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回顧：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統編本的演進與定位。國立編譯館通訊，14(3)，2-5。
- 漢寶德(2001)。國家文化政策的回顧。國政研究報告。
- 劉大杰(1990)。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
- 劉美吟、楊惠珍(1997)。國中國文科課程標準的演進與探討。中等教育，48(5)，68-80。
- 蔡元培(1968)。蔡元培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
- 藍順德(2003)。教科書開放政策的演變與未來發展趨勢。國立編譯館館刊，31，3-11。

初稿收件：民國 94 年 9 月 8 日

完成修正：民國 94 年 12 月 23 日

正式接受：民國 95 年 1 月 6 日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ilation of “Classic Literature Work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s and the Canon

Ya-Wen Ho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evel of compliance between the se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the canon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s. Discussion of “literary canon” in the West has indicated that schoo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and extension of “canon”. In terms of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plays a paramount role in the se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in the high school level.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complete their “literary classics” education through the school curriculum. As such, exploring the se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canon”.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collected relevant statistics, analyzed and classified classic literary works that have been selected most frequently for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s from 1953 to 2005. The article also lists the existing “canon” of the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used by current university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s as the control group. By comparing the above two results, we can observe the level of adoption of works or deviation from the established “canon” present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classic literature education.

From the research, a high propor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that were selected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works of renowned authors of “literary histor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parties, popular trends and influential literary critic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anonization” of many work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s and the “canon”, a future article shall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classic literature” in 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s and the “canon”.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national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 literature, canon, history of literature